

的內容極其龐大而複雜，若筆者誤讀此書的論點或資料，望斧正和見諒。

金弘吉

韓國江陵原州大學

松浦章，《清代帆船東亞航運與中國海商海盜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337頁。

日本關西大學松浦章繼承其師大庭脩獨特的學術傳統，對於明清以降的東亞各國間貿易、航運業、海上人羣等領域都作出令人矚目的成就。2009年出版的《清代帆船東亞航運與中國海商海盜研究》一書，包括了清代帆船在東亞海域航運活動以及同時期海商海盜情形兩大主題，是松浦章長期研究成果的一次結集，較為集中地顯示了作者獨特的觀察視角和治學路徑。

傳統中國的傳世文獻關於海洋活動記錄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分散零碎。因此，常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政府的管理層面，而對於從事海洋活動的人羣、具體的貿易過程等方面的探討則極為有限。引導這一領域研究進展的，是各種新資料的不斷開掘。1950年代以前，主要是傅衣凌對於福州留存的柔遠館、琉球人碑刻資料的調查和搜集（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蹟調查記〉，載薩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福建對外貿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48，頁59-66）。1960年代以後，雖有不少筆記、文集中相關內容的發現，而最為顯著的成績當屬漂流、海難資料的集中發掘和使用。大庭脩對於日清貿易之間的書籍流通與文化交流的研究，開創了利用漂流船資料的研究路徑（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在此基礎之上，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漂流船資料，並與臺灣等地學者合作，展開大量的研究。此外，王振忠利用《唐土門簿》、《海洋來往活套》等留存日本的民間文獻，豐富了我們對於清代徽商海外貿易活動的認識（王振忠，〈佚存日本的蘇州徽商資料及相關問題研究〉，載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519-578）。可見，今後推進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大關鍵是域外文獻的利用。

松浦章的研究正是在大量資料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本書所使用的資料有

日本、朝鮮等地留存的漂船資料、航海日志、公藏檔案、近代領事報告和報刊、地方志、文集、筆記等。在全書第一部第一編〈清代帆船的航運史料〉中，作者介紹了《清代帆船東亞航運史料》所收入的以清代航運為中心的朝鮮、中國、日本三國各具特色的史料。他又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宮廷檔案為例，展示了清代航運中心之一福建省的物流、稅收、乘員等具體航運記錄。在這一展示的過程中，作者對種種航運史實的解讀，集中說明了帆船對於清代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的重要性，並提醒我們重視這些為昔日研究者所忽視的資料。在種種航運資料中，最有特色的當屬清代帆船漂到日本的筆談資料。此類資料在日本收藏最為豐富，也是關西大學一直致力於收集整理的一部份。作者結合親身整理的經驗，指出了筆談資料的若干特點，如具有較強的可靠性、圖像資料豐富等，對我們了解清代鄉情民俗、社會風貌極有助益。如果說上述兩篇文章主要從宏觀上介紹清代航運的史料，那麼在第一編的最後，作者又以《遐邇貫珍》為中心，通過大量的實證和辨析，考察了太平天國時期江南社會種種變動的消息是如何傳入日本的。可見，日清兩國的信息溝通主要是以航運為紐帶的。這一例證，十分有力地說明了域外文獻對於我們開拓研究視野的價值。

第一部的其他部份都是關於清代航運的若干層面考察。大體可以分為〈清代帆船與日本航運〉（第二編）和〈清代帆船與東亞航運〉（第三編）兩大部份。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松浦章關於清代航運的總體評價。他認為，由於造船技術水平的顯著差異，直接導致了各國海洋活動頻率的差異。因此在清代，「東亞海域的制海權由中國帆船一手掌握」（頁3）。這一論斷與傳統的清代「閉關鎖國」觀點截然相反，卻是在一系列具體考察中提出的。這些考察，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儘管清代沿海存在種種海船的名稱，作者通過大量的資料梳理，指出：由於海洋條件的不同，帆船的構造也不盡相同。但是總體而言，主要分為沙船為代表的平底海船和鳥船為代表的尖底海船兩種系統（頁8）。這一結論，不僅說明了清代航運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船型對於東亞海域不同地區的意義是不盡相同的。由此，作者的研究進入第二個層面，即該書的第一部第二編。該部份以日本為中心來考察清代帆船，主要是沙船體系中的山東和上海商船如何在江戶前期參與長崎貿易的。山東船由於數量少，且常有運糧任務，赴日的機會不多。而上海沙船則大量參與長崎貿易，只是在江戶後期，由於日本貿易限制的政策，使得載貨量更大的鳥船取而代之。這兩個地區的考察和比較，並不足以讓我們了解整個清代航運的情形。於是作者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以清代中

國沿海為中心的東亞航運層面，即第三個層面。作者顯然是有意地從北而南展示這一格局。北部的山東，尤其是膠州，是與南部各個港口的連接處。對於上海南市的形成和發展的考索，則旨在說明五口通商以前沙船在上海經濟發展中的顯著地位。而寧波是中國龐大水運網絡與海運網的中樞，乍浦是中國沿海貿易和海外貿易的交叉，突出了清代浙江航運的重要性。至於福建，則是這一時期海洋活動最為豐富、範圍最廣的地區。這樣，一幅東亞帆船貿易網絡的宏偉畫面便建構起來了。

本書的另外一大主題是第二部的中國海商海盜研究。岸本美緒在反思日本學界地域社會論時，提出這樣的建議：「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觀察立場來俯瞰整個社會，而是由社會中各個角落來選擇別的人羣行動，這些行動才是了解社會的真正本質。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思考人們為何這樣地活動時，問題的方向性勢必是從人們的行為與動機出發，成為一種微觀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0期（2000年9月），頁169）。那麼在海商海盜的研究中，究竟是從高高在上的朝廷、文人的角度來理解此類人羣，還是立足於海洋社會進行研究？

在「前言」部份，作者開門見山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從海洋史觀的角度來描述中國的歷史」，並付諸於具體的研究過程（頁213）。對於嘉靖倭寇的研究中，作者在以往學者辨明倭寇既有中國人又有日本人的基礎之上，指出這一時期倭患的原因在於，中國沿海地區對海外貿易需求的日益高漲，與日本國內饑饉所導致的橫行搶奪是互動的，應該從「東亞海域史」、「環中國海域史」的角度進行重新審視。對於正德元年（1506）崇明島的施天常海盜事件，作者的觀察視角也是立足於崇明島的地理、社會、經濟狀況之上，而不是簡單地作出是非判斷。至於對王直的考察，更是獨樹一格。作者從鮮為人知的葡萄牙人的記錄中，勾勒出王直前半生在日本的活動，如最早將槍炮傳入日本、在日本等國深受信任等情形，展示了這一時期中國海商在東亞海域文化交流的作用，進而說明了明代海禁對於海洋社會的衝擊。

除了海洋史觀，作者在這一部份的研究還有兩處值得注意。其一，在第一編〈東亞海域的海商與海盜〉的概說性文章中，作者鉤稽從唐宋元到明清中國沿海的種種海商海盜的史料，說明清代是中國海外活動最為顯著的時期，也展現了作者貫通研究的治學路徑。其二，對於海盜的研究，具有較強

的現實關懷。他對於臺灣海盜問題的研究，除了從海洋社會角度理解海盜的產生，還對比中華民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態度和措施，強調了海盜絕不是歷史問題，至今仍需要各國共同協作，維持地區海洋社會的秩序。

綜觀此書，雖然只是一部論文的結集，其中卻貫穿着松浦章的海洋史觀，以及他對於清代海洋活動的重視。在這樣的主線之下，呈現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個案分析、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從而勾勒出東亞海域社會的多重圖像，足為後起者參考借鑒。

黃忠鑫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楊妍，《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291頁。

《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政治文化分析》運用政治文化、歷史及比較現代化等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中觀層面出發，對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意識的關係進行探索，以當時主要的報刊、雜誌、專著為基本史料，尋找政治事件之展開的動因，動態分析政治體制及其演變脈絡，提出作為地域主義的省籍意識，一方面是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和政治信仰等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產物，同時也是政治文化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的觀點。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傳統社會政治變遷的重要機樞，也長期受到學者的關注，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有關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遷顯得特別劇烈，線索也很複雜，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楊妍從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這組矛盾概念入手，介入該時期的政治史乃至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深度，顯示了一定的學術勇氣。作者認為在清末民初的特定時段中，地域主義始終與現代國家觀念和認同意識保持相互關係，並與國家認同產生一定張力。在當時傳統帝制解體後，國家認同處於一個轉型期，認同多元而游離，而省籍意識卻躬逢其時，獲得滋長且成為此時構建國家認同的一個嘗試途徑，聯省自治乃至聯邦制的選擇與實驗，均顯示了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間的良好互動。但結局卻是失敗的，因為這種嘗試最終沒能走通，中國政治獨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實現的，由此省籍意識淡出，國家認同愈益強化。